

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影响因素与导向原则

邱晓佩^{1*}

(^{1*}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以新型生产关系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从人文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出发, 探究影响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三要素, 即经济活动在宏观社会中的结构性关系、人文精神与经济活动之间的交互性作用、文化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产业化现象。以此为理论基石, 人文与经济之间的互动表现为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了三重导向原则: 民族性人文烙印、人民性价值旨归与先进性文化指引。以人文导向调适新型生产关系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打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人文思路。

关键词: 人文经济学; 新型生产关系; 影响因素; 导向原则; 新质生产力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Guiding Principles for Constructing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Qiu Xiaopei¹

(¹Marxism Institute,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PC,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cessit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responding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advanc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this study explores thre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activities within the macro-society, the interactive dynamics between humanistic spirit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ultural activities within economic practices. Building on thi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istic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provides theoretical empowerment through thre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establishing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imprint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the people-centered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guidance of advanced culture. Guided by humanism, adjusting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boost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Humanistic Economics;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Influencing Factors; Guiding Principl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23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23BKS03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问题研究》(2023DXXTZDDYKT037); 2025年度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专项课题《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视阈下新质生产力的守正创新研究》(202517)。

作者简介: 邱晓佩, 女, 硕士, 研究方向: 人文经济学

通讯作者: 邱晓佩, 通讯邮箱: 13732275784@163.com。

引言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动能内在地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以新型生产关系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当前，我国的生产关系中还存在诸多同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1]。相应地，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任务，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抓手。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2]。人文经济学始终将经济活动嵌入宏观社会结构并紧密联系特定人文与历史背景，以人民主体创造性为根基、人民立场为价值导向，其理论内核恰好为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这一历史任务提供了内生性的人文指引。

当前，学术界对新型生产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的阐述。其一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聚焦于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的变革。在生产环节，关注重构新型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协同关系、统筹劳动者的技能升级^[3]以及避免劳动者在技术异化下的边缘化现象^[4]；在流通环节，主张通过规制平台垄断保障劳动者话语权，关注平台经济中的劳资关系调适^[5]；在分配环节，聚焦要素分配正义，要求承认数据贡献保障劳动者话语权^[6-1]；消费环节则强调数字包容性，在政策建议上主张用公共政策保障消费正义^[4-2]。其二是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层面出发，主要关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以及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7]。不论是从当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时代变化出发进行的学理阐释，还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最新政策和抓手为导向完成的逻辑分析都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新型生产关系研究中人文导向受到关注的趋势愈发凸显，学界普遍认为生产关系变革必须超越单纯的技术适配逻辑，实现“生产关系的调整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8]，最终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核心价值目标。这一研究共识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在劳动者维度，学者们强调新型生产关系需回应数智时代劳动者技能转型与权益保障的双重需求。洪名勇指出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新型劳动者”需具备数字素养和创新能力，而生产关系调整应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培育人力资本^[6]；罗建文则提出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平台经济等新业态中防止算法控制导致的劳动异化^[9]。在分配维度，研究聚焦知识价值实现与分配正义，刘文祥认为数据要素参与分配时需确认劳动者的数字贡献，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保障“知识资本化”过程中的合理回报^[5]；王平进一步指出平台经济中的生产关系需平衡资本效率与劳动权益，避免数字鸿沟加剧分配失衡^[4]。在发展维度，学者们主张生产关系应促进人的精神解放，熊亮分析认为智能化技术应推动“自由自觉劳动”的实现，使生产关系成为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载体^[10]；孙代尧、苏瑞鑫则强调新型生产关系最终要达成“劳动者不再是被动的生产要素，而是享有技术红利的价值主体”的人文目标^[11]。由此可见，由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并不能单一地从技术生产力的视角出发，也并不能忽视其中的人文力量、文化导向的作用。从人文精神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来分析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影响因素和导向原则，在人文价值方面存在有待探索和深化的空间。鉴于此，本文将围绕人文经济学的三重研究对象界面展开深入探讨，剖析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尝试为新型生产关系构建民族性人文烙印、人民性价值旨归以及先进性文化指引这三重导向原则。

1. 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三重要素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提到过，“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2]。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中的所有制关系、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以及生产结果中的分配关系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研究的对象。这一研究对象的确定区别于国民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财富生产的研究，将研究对象拓展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经济活动所在的社会和历史结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文精神与社会结构之间衍生的经济活动关系，因此形成了以经济活动在宏观社会中的结构性关系、人文精神与经济活动之间的交互性作用和文化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产业化现象这三重研究界面。

1.1. 经济活动在宏观社会中的结构性关系

首先，经济活动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表现为嵌套式的有机整体。恩格斯谈到事物的“辩证图

景”时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3]。考察经济活动的物质表现和社会形式也是如此。将其与社会、人文、历史等具体的条件相关联，放置在宏观社会结构系统中研究，是研究经济活动的必然要求。只有在宏观社会结构系统中联系具体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人文背景等要素来考察经济活动，才能更好地将人文与经济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和物质表现相协同。

其次，宏观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影响经济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人文背景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水平、作用、意义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发展的差异为例，一方面，在中国封建社会背景中，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统治中形成，并围绕封建地主阶级作为社会结构中的统治地位展开。原始公有制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被破坏，生产力难以进一步发展。同时，血缘关系、宗族式的社会组织带来“人伦的思想”，社会文化模式阻止了原始科学结构种子的自我萌芽^[14]。另一方面，在西欧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受到货币的破坏，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14和15世纪发展起来了。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结构中的新兴阶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增殖的经济运转中逐渐取代封建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面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同表现，尤其是在观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发于不同社会的线索中，马克斯·韦伯在对资本主义的伦理分析中指出，资本主义曾存在于中世纪和古代历史上的许多社会之中，这些社会并不缺少资本主义，而是缺少一种自身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的精神和组织，这种精神和组织又是受不同的宗教文化导向产生的^[15]。可见，结合具体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人文背景，对于客观看待经济活动的表现有着文化层面上的必要性。

最后，宏观社会结构与经济活动的运行方式之间存在相互投射效应。经济活动作为社会领域活动中的一个子系统，经济活动的运行受到社会宏观结构的限制，两者之间也会产生相互投射、模仿的互动现象。一方面，经济领域的范围大小、经济活动的限制边界，不是取决于经济领域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人文背景和社会宏观结构^[16]。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目前经济领域的科技要素越来越活跃，但是这种活跃的要素并不能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单一指标。从人工智能技术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引领效应来看，它在经济领域的应用，需要结合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伦理、道德限制因素的考量。生产关系也在该限制范围内与之相适配地调整、升级。另一方面，经济领域内部活动的运行方式也与政治、文化领域等活动的运行方式的投射影响。在中国古代的唐宋时期，行会制度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封建等级制度在城市经济活动中的投射体现。封建等级制度在政治领域表现为集权独裁的运行方式，对应地，行会制度在就业垄断和行业管理方面也具有封建特权的表现，在对成员经营活动的管理上带有“超经济强制”的色彩^[17]。

1.2. 人文精神与经济活动之间的交互性作用

在宏观层面上，经济活动对人文精神的塑造起着决定作用，同时经济活动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引领作用。经济活动是一种在社会历史演进中的实践活动，经济活动与社会历史活动都是以人为主体，并对推动社会历史演进有着关键性的作用。经济活动在物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同时对社会关系和人类文化有着概括性的表现和深刻的塑造作用^[18]。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和人类文化，内含着丰富的精神要素，形成一种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势能。在一个地理区划表现出的国家精神、民族风貌、风俗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化人文特征，是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结果，并反过来对基于各特殊社会背景下发展的经济活动提供相应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下，为寻找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新质态，必须重新审视人文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导向作用。习近平同志在谈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曾指出：“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使人的经济活动与动物的谋生行为有着质的区别。^[19]”从根本上说，虽然经济决定文化，但是任何经济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带来的人文价值，能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起到凝聚、润滑、整合的作用，从而塑造劳动者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推动经济活动的发展。

在中观层面上，经济实践过程中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环节中时刻体现出人文精神的价值导向。从经济活动的总体来看，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前提下的，始终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体现为对人民期望的深刻理解和有效回应，以确保政策选择和人民意愿是处于紧密相连的状态^[20]。从经济活动的部分来看，经济活动在“生产—

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表现出复杂性，经济政策的制定充分考虑经济活动在这四个环节中与新的生产力适配发展的表现，并起到统筹、协调的作用。在生产环节中，企业在市场中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发挥创新生产作用提供平台载体，作为科技创新的主力来提供动能，并形成以创新协同机制为导向的目标；在分配环节中，生产各要素合理的初次分配促使新质生产力要素的市场价值得以更好发挥，形成科技创新人才的收入激励机制与产权保护法规，对创新精神起引导作用，增强劳动者自主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在交换环节中，市场规律引起行业之间、行业内部的生产竞争，这种竞争促使生产关系下的各层级的生产者不断进行技术和管理创新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以市场主体的身份通过市场竞争来优化资源配置，政府以实现保障公平竞争和正常秩序的长期发展理念做好市场引导；在消费环节中，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的人文精神为倡导的消费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强调绿色消费、文明消费，体现了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观念在生产关系中的理性化和文明化的加强。

在微观层面上，人文精神能够强化劳动个体在组织、企业等经济团体中的能动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促进社会主体间的相互沟通和社会凝聚力的形成^[19]。”在经济活动的个体层面，经济发展的组织效能主要表现在对企业的建设上。企业的经济活动、人文精神建设来源于社会、历史，也成为人的能动创造性的主阵地。不同的社会、历史的人文背景，对工业企业活动、商业企业活动，在组织效能、生产效能和应对内外不确定性的选择等层面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这些受人文因素影响的工业企业活动、商业企业活动又是人作为经济活动主体发挥能动性的微观载体，有利于人发挥创新的人文精神导向，能够赋予企业、组织更好地营造推动人在经济活动上发展的条件与环境，在精神追求上驱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创造。

1.3. 文化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产业化现象

第一，从物质生产向度来看，文化活动的产业化现象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一方面，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推动当前阶段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21-21]”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文化消费需求与日俱增，人民的精神需求可通过文化消费行为所提供的情感价值、精神供给、价值符号等收获充实与富足。从市场表现来看，2025年一季度，文化企业（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的营收比上年同期增长6.2%^[22]，表明文化需求在人民消费行为中呈现上升态势。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化赋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驱动力。文化事业以及与其相关的服务业的商品化发展能够直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并且，文化产业的建设有助于物质产业和文化产业保持良好的比例，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随着文化产业比例不断上升，劳动者的文化消费比重不断增加，通过劳动者接受教育培训、享受艺术娱乐活动等消费行为实现劳动者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再生产，从而提高具有一定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劳动者比例，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创新发展。

第二，从精神生产向度来看，随着文化产业经济体不断壮大，其中文化内涵的发展会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一方面，文化的产业化可以推动文化内涵的传播，是因为相较于物质文化产品不丰富的状况，文化的产业化能够带来文化产品在商品数量上的丰富，并借以此形式更大范围地、更高效地传播商品内涵的文化；另一方面，文化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存在为了满足消费需求而与一般物质生产无本质区别的大批量生产的、失去了独创性和主动性的文化生产方式^[23]，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视角下要以一定的文化生产原则为准，避免全然地将文化生产纳入市场经济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的考量中。

第三，从物质与精神生产的结果向度来看，内涵文化价值的文化商品能够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海、进一步守好意识形态阵地。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4-21]”文化生产领域同物质生产领域一样，文化生产的产品按照经济规律进入交换、消费和流通领域，其内在的文化内涵也与之一起在经济系统中流通而扩大传播范围。利用好这一规律，既可以通过文化产品将中国的民族文化向海外传播，加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和民族主体性，在面对文化殖民主义即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文化凭借其强势的传媒优势将自己的经济政治理念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用以在思想和文化上影响和同化其他国家这样的现象时^[25]，也能够保持警惕态度，提前采取防御手段。

2. 人文经济学赋能新型生产关系的导向原则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4]”在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演进过程中，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此时，冲破原有生产关系的束缚，变革与新的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旧的生产关系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以生产关系的重构为条件，始终坚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的具有辩证统一特点的生产力理论。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应当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经济活动所在的社会和历史结构中的关系，并且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直接目的。在人文经济学视角下，对于调适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 and 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关系，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的议题，有着民族性人文烙印、人民性价值旨归、先进性文化指引这三重导向原则。



图 1 新型生产关系的三重导向原则的形成逻辑

2.1. 构建具有民族性社会人文烙印的新型生产关系

第一，实现物质与文明相协同以体现社会人文烙印的整体性。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社会情况来看，当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处在不协调、不平衡的状态，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26]。在西方式现代化发展历程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西方社会精神与物质、灵与肉、感性与理性产生分裂与对立。物质主义兴盛，精神生活的世俗化、物化成为现代精神生活的根本境遇。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就同某些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21-2]；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物化”进行了研究，这是顺应物质主义兴盛和精神生活世俗化变迁的产物；席勒批判在大机器生产模式下，人被简化为单一的生产环节。在西方式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中，操纵新科技革命、产业革命造成社会两极化加剧，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全面异化^[27]。在当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不仅要超越西方式现代化资本逻辑的经济形态，而且要构建彰显中国人文、经济与体制等发展优势的经济形态^[28]。

第二，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彰显社会人文烙印的特殊性。“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29]。”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初步形成，强调了文明的教化作用。强调中国人文精神对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效用，是建立在理解中国宏观社会机构基础上的。中国宏观社会结构始终离不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流。在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必须回归到中国特有的宏观社会结构上。在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变迁的历程中，我们始终围绕着人民的需要展开一系列政策工作。始终关注经济学发展中生产关系的人本位，而非去价值化走入一个数字模型构成的公式化世界。

第三,把握伦理边界以平衡社会人文烙印的适配性。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美好生活意味着社会秩序安定、发展速度平稳、社会环境公正。在社会层面来看,以全体人民为中心,以普遍幸福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是内含道德功能的经济,人民需要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框架^[30]。利用好经济活动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投射作用,在上层建筑的发展中投射对经济领域的人文要求,也将进一步规范经济活动的伦理边界。

2.2. 构建坚持人民性价值旨归的新型生产关系

第一,从国家发展的历史向度来看,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为形成强调经济发展的价值维度的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了魂脉根基。从“义利之辩,乃儒家首义”“天下事,唯义利”“用天下之财,益天下之人”等道德逻辑层面的经济观点,到“掌握粮食货币权衡,可定天下”“市场,货物之准则”的理念和方法,再到“民不增税而国用充足”“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的治国理念,以及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庶民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等社会分配现象的深刻反思,都在道德伦理和富民惠民等人文文化层面为经济活动设定了道德规范,并在国家经济治理实践中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人文导向。这样的价值追求,根植于中国发展的数千年历史,深种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形成深远的文化作用,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在无形中引导着新型生产关系的人民性价值走向。

第二,从社会治理制度向度来看,新型生产关系的制度建构逻辑始终以“以人为本”精神为根本坐标系。这种精神传承不仅体现为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典治理智慧的延续,更在现代经济体制建构中实现了价值范式的创造性转化。当生产关系变革触及产权结构、分配方式与交换秩序等环节时,民本精神将人的发展需求作为制度设计的核心,使生产资料配置、财富分配机制与市场运行规则始终锚定于人的价值实现这一终极目标。在经济治理的实践层面,民本精神展现出双重规训功能:既对资本逻辑形成伦理制衡,又为政策工具划定价值边界。这种规训机制通过制度化的路径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原则——从“利民为本”的施政纲领到“藏富于民”的财税设计,从“均平为要”的分配理念到“普惠共享”的市场准入规则,可见民本思想对生产关系的塑造作用。政策实施过程中,这种精神更通过动态反馈机制持续校准改革方向,确保效率追求始终受制于公平准则,市场活力的释放不偏离民生福祉的轨道。从文明演进的长周期视角审视,“以人为本”精神已超越具体政策工具层面,升华为中华经济文明的文化基因。以文化基因的价值连续性,促使当代中国生产关系变革既保持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动态适配,又坚守着文明传统中“民本思想”的精神原点,形成具有中国经济治理文明新形态。

第三,从个体创新的实践向度来看,高素质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力量,受开放、公平的人文氛围引领能动地发展创造力。高素质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创新能力的发挥,依靠于团队、企业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文化因素。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行为需要相对标准的运行模式,在市场上形成稳定的经济预期,这更加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精神引领功能,在规制经济主体观念认知的过程中优化生产关系,提升要素利用水平,促进生产方式的迭代演化。例如,个人诚信、契约意识、尊重产权、合作共赢等价值理念既能对经济过程本身起到秩序规范效果,又能以文化道德等共识性准则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加强产权保护,从根本上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在企业、团队中发挥文化的精神纽带作用,形成“共富”理念的引导,在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的创新活动过程中,实现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共生发展。个人层面的创新活动需要资源要素的流通共享、创新个体的激励关怀、活动环境的宽松包容,人文精神在这三个要素的综合效能上的表现成为对创新活动的重要发展动能。

2.3. 构建以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的新型生产关系

第一,先进文化在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发挥的价值引领作用。以农业文化为例,农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农耕智慧、生态思想、自治伦理,与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的乡村振兴战略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文化资源与战略目标的相辅相成,要求将民族精神特质转化为制度设计的文化基因。纵观社会整体,在政府层面,政府作为文化治理主体,需通过政策调控、资源配置实现以先进文化引领文化生产资料的价值导向;在企业层面,如何将先进文化使用价值的创造纳入市场逻辑是企业与实践层面关注的重点;在个体

层面,社会组织与个体的文化实践在多元主体的协同倡导中不断加深先进文化的实践深度和广度。三重主体从不同维度为实现先进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提供不同的实践进路,最终为促进文化产业的顶层设计的完善,为新型生产关系构建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在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环境构建中,先进文化营造创新、包容与可持续的文化产业生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化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静态的,而是相互作用、动态发展的。经济以文化为支撑,文化赋予经济内在灵魂,并以强大动力推动经济发展^[31],形成一个动态的生产力运作系统。这种动态机制体现在文化产业中就是文化创新活动的实践,并通过这样的实践反过来作用于文化产业生态。也就是说,文化在经济业态中的发展和构建文化生态生成发展的根本机制在于文化实践和创新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创新是文化产业的生命线,先进文化鼓励创新、发挥文化原创力的强大作用^[32],推动文化内容、形式、技术不断革新,促进形成更加优质、开放的文化环境、文化生态。开放的文化环境则进一步促进国际文化产业发展,推动国内外文化交流,助力本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传播本国文化,提升国际影响力。这种生态构建通过文化原创力激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新维度,使文化创新成为推动新型生产关系演进的内生变量。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引领,以文化产品为切口为新型生产关系注入精神内核。一个社会有机体的良性发展,必然要诉诸维系其存在与发展演化的价值根基^[33]。在经济领域,核心价值观引导企业注重诚信经营,以质量赢得市场,以信誉塑造品牌,从而优化市场环境,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公平正义原则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均衡发展。在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塑造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凝聚社会共识,减少新型生产关系构建中的矛盾与冲突,增强社会凝聚力。文化层面,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为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为新型生产关系构建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观念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演进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一致的,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述:“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2-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力能够在新型生产关系构建的实践进程中不断发挥精神灯塔的作用,照亮经济社会发展的前行道路。

3. 结语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人文经济学聚焦人文与经济之间的互动机理,为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理论启发。从理论层面的生成逻辑可知,人文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作用于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在社会结构与经济活动之间的总体性发展,还是人文精神与劳动者之间的投射性表现,抑或文化产业内产品内涵与市场规律之间的辩证性冲突,都彰显出将人文因素与经济活动并列为核心逻辑的人文经济学,为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带来了创新性理论视角。据此,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时,要更好地融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神凝结,坚持与“以人为本”价值追求相结合的根本动力,锚定与更高阶段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发展方向。简言之,即牢牢把握民族性人文烙印、人民性价值旨归与先进性文化指引的三重导向原则,使其成为理论推进与实践调适过程中的航向标。同时,生产关系所涉及的经济关系与社会现象错综复杂,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仍存在多种挑战。因此,要积极探索上述三重导向原则调适新型生产关系的实践路径,通过新型生产关系的人文力量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书写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崭新篇章。

参考文献:

- [1] 蒲清平. 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J]. 国家治理, 2024(09): 33-38.
- [2] 何聪, 郑海鸥, 王伟健. 一座城, 创新实践人文经济学(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观察)——苏州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调查[N]. 人民日报, 2023-09-08(1).
- [3] 尹俊, 孙巾雅.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 改革, 2024(05): 45-53.
- [4] 王平. 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新型生产关系: 塑造与调适[J]. 当代经济研究, 2024(07): 5-15.
- [5] 刘文祥. 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05): 41-47.

- [6] 洪名勇. 以新型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个马克思理论的分析框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03): 1-17.
- [7] 周文, 李雪艳. 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 15(04): 84-99.
- [8] 刘立云, 孔祥利.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J]. 经济纵横, 2024(12): 33-41.
- [9] 罗建文. 论完善新型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J]. 湖南社会科学, 2025(02): 1-11.
- [10] 熊亮. 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变革及新型生产关系构建[J]. 江海学刊, 2024(04): 119-125.
- [11] 孙代尧, 苏瑞鑫. 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内在统一的学理阐释[J]. 科学社会主义, 2024(04): 4-12.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 刘震, 张祎嵩. 中国封建社会到底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对经典命题的重新审视[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3, 4(04): 211-223.
- [15] [德]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阎克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41-42.
- [16] 胡承槐, 顾青青. 人文经济学的概念、对象、方法及其实践性、科学性[J]. 浙江社会科学, 2024(06): 18-26+156.
- [17] 金志霖. 试比较中英行会的本质特征[J]. 史林, 2005(02): 100-108+124.
- [18] 代玉启. 精神富有: 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维度[J]. 浙江学刊, 2024(06): 77-87.
- [19]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49.
- [20] 王忠, 车学森. 人文经济学研究: 理论演进和话语创新[J]. 江苏社会科学, 2024(02): 77-86.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22] 国家统计局. 2025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6.2%[R/OL]. (2025-04-29)[2025-06-22].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4/t20250429_1959509.html.
- [23] 陈立旭. 理解人文经济[J]. 浙江学刊, 2024(06): 66-76+235-236.
-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5] 刘海静. 全球化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殖民主义[J]. 理论导刊, 2006(02): 77-80.
- [26] 王晓静, 刘士林, 杨珺涵. 人文经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意义[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09): 41-50.
- [27] 任平.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 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人文逻辑[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77(04): 5-13. .
- [28] 孙建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人文经济学的建构旨趣、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深入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06): 1-9.
- [29] 周易[M]. 杨天才,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207.
- [30] 罗卫东.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属性[J]. 浙江社会科学, 2025(01): 28-41+156.
- [31] 方世南. 在先进生产力和人力辩证统一中把握新质生产力[J]. 观察与思考, 2024(08): 5-12.
- [32] 任平. 发挥文化原创力对人文经济的持久推动作用[J]. 国家治理, 2025(07): 25-33.
- [33] 项久雨. 美好社会: 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展开与演化图景[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06): 4-25+204.

(栏目主编: 刘玮 校对: 张力)